



未名社科·媒介与社会丛书（翻译版）

Numbered Voices

How Opinion Polling Has Shaped American Politics

用数字说话

民意调查如何塑造美国政治

〔美〕苏珊·赫布斯特 (Susan Herbst) 著

张健 译 杨席珍 校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项目号: 15BXW062) 的阶段性成果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6-106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用数字说话:民意调查如何塑造美国政治/(美)苏珊·赫布斯特著;张健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1

(未名社科·媒介与社会丛书:翻译版)

ISBN 978-7-301-20537-2

I. ①用… II. ①苏… ②张… III. ①民意测验—社会调查—研究—美国 IV. ①D771.2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28918 号

Numbered Voices: How Opinion Polling Has Shaped American Politics, by Susan Herbst

© 1993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All rights reserved.

Licens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Illinois, U. S. A.

- 书 名 用数字说话:民意调查如何塑造美国政治
YONG SHUZI SHUOHUA:
MINYI DIAOCHA RUHE SUZAO MEIGUO ZHENGZHI
- 著作责任者 [美]苏珊·赫布斯特(Susan Herbst) 著 张健 译
杨席珍 校
- 责任编辑 张盈盈
-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0537-2
-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 网 址 <http://www.pup.cn>
- 电子信箱 ss@pup.pku.edu.cn
-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5016
- 印 刷 者 三河市博文印刷有限公司
-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 965 毫米×1300 毫米 16 开本 13.25 印张 187 千字
-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定 价 36.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未名社科·媒介与社会丛书（翻译版）

主编 高丙中 杨伯淑

这本书针对“我们为何进行民意调查，民意调查与何物相伴，又如何影响到当前的政局”进行了原创性、发人深省的分析。赫布斯特的学识无可挑剔，写作思路清晰干练，研究成果新颖独特……倘若仔细评估她所提出的问题和她所得出的结论，每个读者都将获益匪浅。

——Doris A. Graber,《政治学季刊》

对跨越数千年的公众舆论进行了富有智慧、理论丰富、历史广泛的阐释……这一历史阐释非常有趣，也富有启发意义。

——Paul Brace,《美国历史杂志》

赫布斯特巧妙地探讨了某些耐人寻味的议题，这些议题对民主、民主政治至关重要。

——Robert Y. Shapiro,哥伦比亚大学

这本书颇为重要，富有理论抱负，基于公众舆论量化调查的历史进行了有趣的原创研究。

——Daniel C. Hallin,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中文版序

好友张健，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教授，翻译了美国政治和传播学者苏珊·赫布斯特的成名作——《用数字说话：民意调查如何塑造美国政治》，并嘱我写序，我唯有斗胆从命。这—是因为几年前他在我校做访问学者时，进一步发展了他对美国进步主义时代政治传播和舆论表达的研究，并在此过程中对这本书产生了浓厚兴趣，跟我谈过将其翻译成中文的想法，我曾一味地鼓励；二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周丽锦女士曾就出版这本书的中译本来邮件咨询，我也是一味地推荐。现在，这本书的中文译本就在我眼前，我理当为读者解释一下，为什么支持出版这本书的中文版。

这是一本小书，从很多方面讲都是如此。我书架上存放的是芝加哥大学 1993 年的硬皮版，它是 32 开本，总共也就 227 页。这本书是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西北大学政治学教授本杰明·佩奇（Benjamin Page）担纲主编的“美国政治与政治经济书系”中的一本，即便是在这个书系中，它也是一部篇幅短小的书。但是，能进入佩奇的慧眼并置身这个书系，本身就证实了这本书的学术价值：佩奇所编辑的这个书系，从 1989 年开始，已经出版了近 50 部（就我所知）在美国政治学、公共政策、传播学和社会学等领域产生重大影响的学术著作，我自己的书架上就有 7 本这个系列的书。尽管为减少经济负担，我非常谨慎地只选购那些品质极好、我必须手可及的

书,赫布斯特这本还是我选购的其中之一。

这是一本跨学科的著作。它是历史学著作,因为讲述的是舆论的量化表达如何在与美国的政治运作互动当中逐渐上升并最终使得“民意调查”近乎成为“舆论”之代名词的历史。但作为历史学著作,它格局不大:它针对一个历史现象并以历史叙事的方式解读其理论意义,虽然将现象追溯到了古希腊时代的雅典城邦民主,但聚焦的还是19世纪以降的美国,如它的副标题所界定。即便是这样,如一位著名政治学家在其充满溢美之词的书评中指出的,这本书是对于这段历史的零星而非系统的叙述,因为作者的用意不在史实的挖掘、甄别和叙述,而主要在理论的解读。

作为一部理论著作,这本书运用韦伯对现代化即理性化的概括,论述了在美国大众民主运作过程中民意或公众如何日渐褪色、变质的过程。赫布斯特通过历史的叙事而论述道,由于问卷调查技术的日渐成熟并被广为应用,由于这个应用所生发出的新兴行业——问卷调查业和政治咨询业,民众表达日益受缚于民调执行者们所设计的意见测量工具,受制于测量工具的表达形式,并被政治操控策略左右,这极大地抑制了民众当中自由、自发的讨论,其结果是,民意脱离其自由、自发的本真性根基,民主政治变质为符号的权威和正当性的争夺,公众蜕化为得不到自主发声机会的群氓。在搭建这个论述框架时,作者受益于美国政治学家摩尔瑞·艾德曼(Murray Edelman)关于符号的政治的论述,运用了韦伯的理性化和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等理论。但是,这并不是一部抽象的理论著作,而是将理论的论述编织于历史叙事当中的一部叙事性著作。它的诱人之处在于可读性很强,并因叙事使理论增添了青翠的绿色。它的不足是,这个取向使得它的理论阐述未能得到深入展开,而且,在论述了舆论测量和表述的“理性化过程”如何导致哈贝马斯式的理想公共领域的颓败后,赫布斯特提不出什么理论上有创意的处方,唯有建议我们回到芝加哥学派的布鲁默在象征互动视角下对公众形成过程的论述。在这部书成书的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也许可以,但在今天就显得理论视野上需要与近20多年来的理论发展接轨。

这样一部小书,出版后广受好评,成为政治传播、舆论、民主理论、

美国政治历史等领域的研究者们的必读书之一。在中国的学术和公共生活场景下,这本书有极强的针对性。它可以启发我们批判地审视我们对“民意”“民意调查”“舆论”“舆论场”等概念的不假思索式的运用,我们对“民意调查”结果的或迷信或粗暴的拒绝,我们对“公众”“公共”“公开”等概念中所应当蕴含的自由、自发、不受制约的讨论等元素可能的忽略,我们将“公众”简单地等同于抽象的“人民”或单维度的“大众”的倾向。这些认知和话语偏向,在学术上妨害了我们的理论思考,令我们的舆论和政治传播的研究领域无法走出“统计的合计”模式,并因此而无法有效地在理论上聚焦传播或交往的过程;在公共生活领域,上述认知和话语偏向也会导致我们无意间正当化不经充分讨论的多数人意见,甚至正当化某些对何为多数人意见的简单宣称,并轻视我们应当展开的相互尊重、相互关照、相互融合式的讨论。也许,这本书可以和另外两本小书结合起来,构成公民素养培育的核心读物:一本是美国政治学家詹姆斯·费什金(James Fishkin)于2011年出版的著作,题为《当人民发声:商议民主和公共咨询》(*When the People Speak: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Public Consult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另一本是华裔学者徐贲教授的散文集《明亮的对话》(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

至少,阅读这部书会增添一些我们较少有机会接触到的美国历史和政治知识。也有可能的情形是,这本书会强化一些人对美国民主政治的不信任甚至不屑,因为貌似赫布斯特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所谓“民意制造”的历史过程。这样的解读,当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却极可能是一叶障目。如此聚焦民意或舆论测量技术的历史,如赫布斯特所引用的美国政治学家詹姆斯·布莱斯(James Bryce)和法国社会学家托克维尔所分析的,正体现了将公民主权作为政治正当性的唯一基础这项原则,也是将这项原则在政治生活中操作化的体现。当然,如赫布斯特呈现的,这也是政党和政客们试图将“民意”作为“因变量”予以影响或操纵的一种表现。但即便是后者,这当中也意味着存在某种不得逾越的底线:关于民意的宣称,必须有经验的基础,而不能是无中生有的宣称。这个政治哲学的信念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运作逻辑,体现在赫布斯特对各种测量“民意”的技术“创新”这一历史叙事当中,值

得细细揣摩。其实,创立并采用某种形式的社会测量(民意调查是其中之一),关涉一个社会秩序和权力结构的基本问题:什么构成作为其基础的事实性知识?谁被赋予权力并遵循何种程序设立这样的知识?阅读赫布斯特这本书,有助于我们思考这个问题,尤其是我们还可以结合着阅读美国社会学家奥蒂斯·达德利·邓肯(Otis Dudley Duncan)1984年的著作——《社会测量的历史和批判笔记》(*Notes on Social Measurement: Historical and Critical*,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潘忠党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传播艺术系教授

2016年9月30日于麦迪逊

英文版序

本书最初的意图是考察政治权威的传播。我原是一名政治专业的学生,后来成为大众传播学者,因此,我对个人和机构通过话语赢得影响的方式变得越来越有兴趣。在考虑针对这个题目的经验研究时,美国政治中最著名、最权威的表达之一——公众舆论吸引了我的注意。在一个类似美国这样的大众民主社会里,“民众之声”在领导人和公民中间,同样博得广泛的尊敬,因而公众偏好的表达与评估方式对研究权力的学者们来说尤为有趣。

随着抽样调查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发展,公众舆论成为学术界内外流行的、令人兴奋的研究焦点。从早年以来,研究者们就完善了从人口中抽取随机样本的技术,将访谈实践标准化,并开始使用电脑以求得高效的数据分析。在那个年代,学术机构、市场研究供应商、政治顾问、专业的民调人员和其他人士使用调查研究方法去探究美国公众的态度,比如,在标准的总统竞选过程中,晚间新闻、重要报纸版面不间断地参考民意调查。连续几个月,政治家、公民、记者密切追踪民意调查,但对调查结果权威性的指责也纷至沓来。尽管存在习惯性的抱怨,但民意调查在美国政治过程中已经稳居其位,很少有候选人在竞选公职、表达对时下议题的观点,或改变竞选策略时不问计于民意调查。

本书并非要分析公众态度自身,而是要探究公众与

论的历史与含义。尽管问卷调查现在已经司空见惯,但我们很少反思调查所提供的数据的性质,调查如何获取权威,或为何调查在公共话语中承担如此重要的角色。在本书中,我试图处理这些问题,同时也探讨公众舆论表达和测量随着时间而不断变化的特征。由于公众舆论现象非常复杂,我综合运用了社会学、政治科学、哲学、传播学中的理论和概念;通过对公众舆论史的跨学科研究,我希望证明,对公众情绪的研究,并不仅仅是调查研究者的势力范围。

本书前面两章为讨论美国政治中的民意调查提供理论基础,对政治历史比对社会理论更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跳过这些章节,从第3章的公众舆论表达和测量的编年史开始。

我在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安纳伯格传播学院(Annenberg School for Communications at the University of South California)时就开始公众舆论的研究与写作。尽管从那时开始,计划的目标和性质已经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但南加州大学的几位人士帮我理清了思路。我尤其感激伊莱休·卡茨(Elihu Katz)和鲍勃·梅多(Bob Meadow),他们鼓励我追踪公众舆论的理论和历史问题。彼得·克拉克(Peter Clarke)和苏珊·埃文斯(Susan Evans)向我展示了如何创造性地思考研究设计,并给了我巨大的智识与情绪支持。

在研究期间,数十位前美国议员和记者耐心地回应我关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公众舆论表达的问题,没有他们的帮助,关于这个时期的写作将完全不可能。

在西北大学时,我从许多同事、学生和朋友的建议与批评中获益良多。在我写作关于当代民意调查的时候,彼得·米勒(Peter Miller)给了我富有价值的建议;丹·默克尔(Dan Merkle)和莎拉·马萨(Sarah Maza)提供了许多有用的引用资料;1990年夏季,彼得·卡西·高尔文(Peter Kathy Galvin)和大卫·扎雷夫斯基(David Zarefsky)帮助我获得了非常急需的研究资助;史黛丝·苏亚特(Stacey Suyat)帮助我从19世纪的报纸中收集资料。我还要感谢帕特·麦克戈拉斯(Pat McGrath),他帮我录入了参考书目。

本系列丛书的主编本·佩奇对本计划非常热心,欣赏它的跨学科风格。他和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的约翰·特瑞尼斯基(John Tryneski)

给了我合理的建议,改进了本书的结构与论证。丹·哈林(Dan Hallin)对原稿的批评对我的修改也非常有帮助。赛琳娜·富勒·克鲁格(Salena Fuller Krug)编辑定稿。

吉姆·贝尼格(Jim Beniger)和我无数次在午餐时和在电话上讨论公众舆论,他对社会理论的迷恋富有感染性,召唤我去做历史性研究。对于他一直以来在学术上的帮助与情谊,我很是感激。

我深感亏欠我的父母,为他们在艰难时期的鼓励和引导深表谢意。最后,我把本书献给我的丈夫——道格·休斯(Doug Huges),感谢他建设性的批评与爱的支持。

以下出版商概允使用第1章、第5章的资料,这些资料最初刊印于以下杂志:“Classical Democracy, Polls and Public Opinion: Theoretical Frameworks for Studying the Public Sentiment,” *Communication Theory* 1, No. 3 (August, 1991),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Guilford Publications; and “Public Opinion Measurement Strategies in the 1930s and 1940s: Retrospective View of Journalist,” *Journalism Quarterly* 67, No. 4 (Winter, 1990), reproduced with permission of the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图3.3系复制于Heinrich Eduard Jacob, *Coffee: The Epic of a Commodity*, Copyright 1934 by Ernst Rowohlt Verlag, 英语版 Copyright 1935 by The Viking Press。使用获得美国企鹅出版集团(Penguin Books USA Inc.)下属维京企鹅(Viking Penguin)公司允许。

目 录

导 语 /001

第一章 定量与理性 /006

第二章 数字与符号政治 /029

第三章 舆论表达与统计方法 /044

第四章 党派政治与模拟调查的符号运用(1856—1936) /071

第五章 国会议员、记者与意见评估(1930—1950) /093

第六章 当代公众舆论研究 /116

第七章 群众估算与公众舆论 /136

第八章 意见量化与民主 /155

参考文献 /181

译后记 /195

导 语

美国在信任、承认公众舆论并发挥公众舆论的作用上,体现出比其他国家更多的胆量与魄力。在美国,公众舆论引人注目,甚于总统、州长,胜过国会、州立法机构,高于全国代表大会以及巨大的政党机器;公众舆论作为权力的最大来源,主宰着为之战栗的人民的服侍者。

——詹姆斯·布赖斯:《美利坚合众国》,1891

(美国人)将商人的习惯带进了政界。他们喜欢秩序井然,没有秩序,事业就不能发达。他们特别重视遵守信誉,信誉是生意兴隆的基础。他们宁愿凭常识去慢慢创造巨富,而不愿凭天才冒险去发大财。按常规办事的思想使他们的头脑保持警惕,不做不切合实际的打算。他们重视实践甚于重视理论。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1850

从共和国最初的岁月开始,美国人就将公众舆论的表达和计算这两种看似不相关的进程看得颇为珍贵。布赖斯(James Bryce)、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都曾对这两种美国文化的组成部分给予评价,但是他们都没能预测出20世纪末公众舆论的表达与量化这两者相互联系的方式。比如,现代民意调查或“抽样调查”已经成为政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那些竞争政治职位的人、那些报道选战的记者以及必须要在野心家们中间进行抉择的选民,都密切关注那些声称描摹公众舆论的数字。

然而,问卷调查并不是政治领域中量化现象的唯一实例。评估政治集会的人群规模、预测选举结果或选民反馈、预测“模拟民调”结果、

预测政治随身用具(比如,徽章、T恤、保险杠的贴纸)的销售数据,还有其他诸如此类的预估都显示了美国公共生活中两类主导性意识形态的力量——科学与民主——彼此之间的相互交织。表达和测量公众舆论的量化技巧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这种技巧的“客观性”与貌似确定性的性质,及这种技巧所具有的阐释许多人各自观点的能力。因为数字化的数据资料往往传播出权威性——理论上,数据提供了普通民众信念的真实写照,政治领导人、民调工作者、记者、利益集团以及公众成员逐渐被这种预测公众舆论的方法所吸引。尽管学术界和特殊场合的记者质疑定量的公众舆论数据的有效性,但他们很少质疑这些数据在政治话语中承载的重要分量。

本书描述分析了定量在美国政治中的崛起,然而,其中特别有意思的是对公众舆论的测量和表达。一个基本的问题为这项研究注入了活力:数字如何用来说明公众情绪?为何定量话语在美国受到如此广泛的重视?既然政治量化的崛起研究并不属于任何一门理论学科,这个问题只能通过多重学科、多重视角来解答,因而本书采用了源自社会科学以及哲学、历史学的分析工具。

数字如何得以在政治中承担如此重要的角色这一问题是我调查研究的起点,但本书的写作围绕两个中心主题加以展开:第一个主题涉及民主和理性之间的联系。每一章节都明确或含蓄地阐述了这两个关键元素在美国公共生活中的联系。问卷调查,还有其他类似的对美国人情绪的量化描述无处不在,这是因为它们在意识形态上似乎毫无偏见,并且它们都旨在传播民意。

第二个主题涉及人们对数字的运用。大众意见的定量描述服务于两种区别而又错综复杂的功能:进行量化是为了使以最有效率的方式采取行动成为可能,也是为了在公开辩论中传播权威性。数字用来达成直接的,有时是特别私人性的使命,但也因其符号性力量而被广泛应用。有时,我们计算意见是为了获知公众偏好,但在其他场合,人们运用此类数字是为了传播人气或正当性。本书阐释了数字这两种贯穿美国政治历史的孪生功能——工具性与符号性之间的关系。

除去这些主题外,还有一系列取自几个学术领域的概念会被用来阐释定量在政治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其中一个概念是合理性或理

性,哲学家们首先用到了理性这个词,后来社会理论家们也开始使用它。对理性这一说法的各种概念化过程,如从韦伯的宿命论版本到福柯更加复杂的版本,都有助于解释统计学在政治领域中的兴盛。另外两个对此项研究比较关键的概念是权力、社会控制。这两者都是对人类行为感兴趣的社会理论家、社会科学家经典的关注对象,它们在政治行为与表达研究中也极为有用。

我应当强调的是,本书是关于行为、表达以及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学者们太过频繁地分析其中一种或者另一种现象,而回避行为与话语彼此依赖这一事实。正如许多当代哲学家和修辞学家所论证的,表达是一种行为类型。忽视话语,对社会和政治生活的理解就不会全面。本书聚焦于人们在政治领域中的行为方式,同样也集中考察人们思考并且议论他们自身行为的方式。

尽管政治领域中的许多(概念)已经量化了,或者至少可以进行量化处理,但要对这个话题展开探索,最显而易见的领域就是从公众舆论开始。公众舆论是本书的重点,因为它毫无疑问处在民主过程的核心位置,也因为量化民意在美国的历史中贯穿始终、随处可见。当代的记者、政治家、利益集团领导人以及公众经常大声抱怨民调太过泛滥,抱怨民调在公共论坛中获得的诸多关注,但其实公众舆论量化的现象早就有了,我们只是最近才关注它。故此,本书的目标之一就是将目前对意见量化的讨论放在其适宜的历史语境中。

本书分为八个章节。前两个章节大体上是理论性的,主要介绍在随后章节中将要用到的概念和框架体系。第一章简要追溯了定量的历史,之后又介绍了两位理论家的观点——马克斯·韦伯和米歇尔·福柯——这么做是为了找出量化的历史趋向。第一章突显数字的工具式运用,将量化作为理性化的一个案例。第二章聚焦于数字的符号式运用,汲取了来自社会学、人类学、政治科学以及哲学的理论;尤为有趣的是,数字的使用方式成为更大范围内政治仪式进程中的一部分。第一、二章共同为分析美国政治历史中公众舆论表达的本质提供了必要的工具。

第一、二章涉及数字的工具式、符号式运用,第三章则专门集中于公众舆论的研究。该章将重点放在了公众舆论的历史上——表达公

众舆论的方法、测量公众舆论的技巧以及公众舆论不断变化的定义。这种对技巧的历史概览——从18世纪法国巴黎的沙龙,到今天的民意调查——见证了意见测量如何与人们所认知的公众舆论的含义一起演进。倘若不了解这些年来的技巧过程,人们便无法理解公众舆论的表达或评估的现代方法,不管是定量的还是定性的。第三章主要讨论了一个在民主理论中比较棘手的界定问题,即公众舆论的含义问题。我坚持认为,公众舆论的含义不仅随着历史环境不断变化,同样也随着传播意见的新技巧的发展而变化。

第四、五章对公众舆论的量化进行了经验研究,考察了公众情绪、各种不同的测量和表达实践、数字的工具式与符号式运用等几个关键的发展阶段。第四章探究现代民意调查的先驱、模拟调查的历史。模拟调查被用于1824—1936年间的总统选举。1936年,《文学文摘》(*Literary Digest*)错误地预测阿尔夫·兰登(Alf Landon)将会在总统选举中击败富兰克林·罗斯福。选举期间,党报记者与政治家们通常会使用模拟调查来使对方候选人、对方政党失去合法性,夸大己方胜出的概率。

第五章紧接着第四章的时间顺序,对1936年之后的公众舆论量化的情形进行了研究。本章介绍了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任职的美国国会议员与著名记者的一项研究。这两个群体都需要理解公众舆论的状况,但是,当很少有人相信新出现的民意调查时,他们如何评估这一时段内的大众情绪?第五章考察了不同种类的研究技术,既有定量的,也有定性的,议员和记者们采用这些技术以便掌握他们的选民和读者的意见。

第六章致力于对当代民调和调查研究进行简单讨论。从早期的意见研究开始,不同的相关方——利益集团、广播媒体、政治顾问、全国政党组织以及其他——已经对购买、收集公众舆论的有关数据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这些相关方对民调的专注度是整个第六章的重点,该章还对当前调查研究方法的新近发展进行了回顾。尽管该章讨论的所有议题早就受到公众舆论研究者的高度关注,但这一部分完善了从第三章就开始的公众舆论研究年表。

第七章主要讨论另一种类型的意见量化——政治集会中人群规